

# 握手风云

毛泽东交往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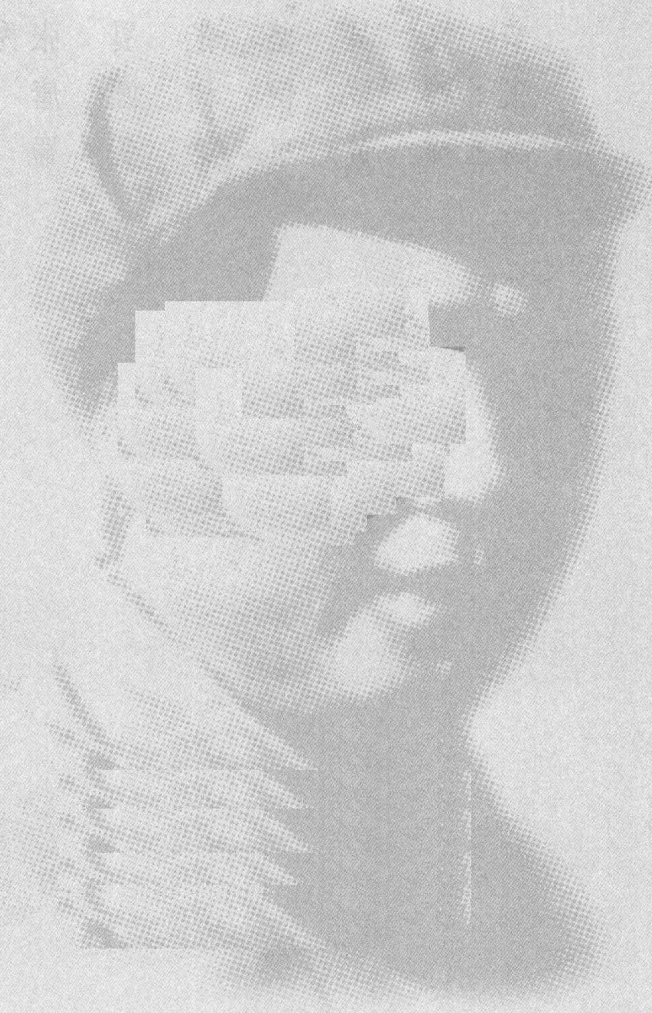
● 张秀娟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 握手风云

毛泽东交往实录

◎张秀娟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握手风云:毛泽东交往实录/张秀娟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2004.3 重印)

ISBN 7-209-02273-2

I. 握... II. 张... III. 毛泽东一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200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8.25 印张 70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8000 定价:60.00 元

## 前言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在黑沉沉的 20 世纪初期，中学时代的毛泽东发过一份《征友启事》，引用了《诗经》上的这句话，意在寻求、联合以“天下为己任”的同学、同志和朋友，共同向着各种恶势力进击，撕碎令人窒息的夜幕，让阳光普照神州大地。

崇高的使命、理性的呐喊，像一道闪电划过夜空。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由此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瑰丽多彩的画卷：从组建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到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嘉兴南湖游船去开天辟地，到推动大革命洪流激扬澎湃；从组织秋收暴动，到点燃井冈山星星之火；从长征途中的精湛雄辩，到遵义古城高擎大旗……沧海横流，大浪淘沙，潮起潮落的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革命的队伍越来越大，无数优秀中华儿女、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像百川汇海般追随涌来；革命的大潮一往无前，锐不可当，一切貌似强大的内外反动势力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与此同时，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胜利，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不断强大，毛泽东由中国走向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毛泽东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旗帜，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瞩目和赞扬。他的理想、精神与业绩走出了国界，他的人际交往也拓展到五洲四海。

毛泽东，永远是一个人们说不尽、道不完、经久不衰的话题。为什么历史的选择会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为什么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能云集这样多的人才、精英？为什么凡是与毛泽东接触过的人，包括外国人，都敬佩不已？为什么毛泽东的功绩连同失误，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毛泽东的魅力何在？答案全都在他的人际交往中。

毛泽东一生接触交往过的人何止千万，可称得上人海茫茫。本书撷取了其中的五个最重要的层面，全方位地再现了毛泽东的人际交往。

在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谨以此书献给希望了解、追寻、探究毛泽东的人际世界奥秘的人们。

# 目 录

## 1 / 经天纬地·毛泽东与同事战友

3 / 堪称史诗般的神圣合作

——毛泽东与周恩来

25 / “长期合作 一朝分手”

——毛泽东与刘少奇

37 / “朱毛不可分”

——毛泽东与朱德

50 / “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与邓小平

65 / 风雨同舟显真情

——毛泽东与任弼时

71 / “国乱思良将”

——毛泽东与陈云

79 / 瑞金告别 竟成永诀

——毛泽东与瞿秋白

86 /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毛泽东与张闻天

94 / “担架悠出的历史佳话”

——毛泽东与王稼祥

104 /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与彭德怀

113 / 知人善任 用其所长

——毛泽东与刘伯承

121 / 赞誉“两把菜刀闹革命”

——毛泽东与贺龙

129 /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

——毛泽东与陈毅

139 / 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与罗荣桓

147 / 长征结谊 刻骨铭心

——毛泽东与徐向前

154 / “荣臻是个厚道人”

——毛泽东与聂荣臻

160 / 疾风知劲草

——毛泽东与叶剑英

166 / “你一仗比一仗打得好”

——毛泽东与粟裕

172 / “罗瑞卿反对你,还没反对我嘛”

——毛泽东与罗瑞卿

180 / 放手使用 关爱有加

——毛泽东与许世友

## 187 / 谈笑鸿儒·毛泽东与专家学者

189 / “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毛泽东与华罗庚

196 / 鼓动发展中国的航空技术

——毛泽东与钱学森

200 / 共商开拓我国的原子能事业

——毛泽东与钱三强

205 / “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打得不错”

——毛泽东与李四光

210 / 难以忘却的哲学谈话

——毛泽东与周培源

214 / “读了你的论文,觉得也该管天”

——毛泽东与竺可桢

217 / “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呢”

——毛泽东与茅以升

221 / “对称何以那么重要”

——毛泽东与李政道

- 224 / “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与杨振宁
- 232 / “恰同学少年”  
——毛泽东与李振翩
- 236 / “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  
——毛泽东与谈家桢
- 239 / “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毛泽东与茅盾
- 243 / 六十载诗书情  
——毛泽东与郭沫若
- 252 /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与丁玲
- 259 / “我不打倒你!”  
——毛泽东与范文澜
- 263 / “为了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毛泽东与周谷城
- 270 / 往者不可咎 来者犹可追  
——毛泽东与李达
- 276 / “你写的文章我都看”  
——毛泽东与冯友兰
- 281 / 乡情友情师生情  
——毛泽东与黎锦熙
- 285 / 领袖诗人和诗人领袖  
——毛泽东与柳亚子
- 292 / 领袖和人民艺术家  
——毛泽东与齐白石
- 295 / 相知情重  
——毛泽东与徐悲鸿

## 299 / 碧海丹心·毛泽东与党外人士

- 301 / 神交已久  
——毛泽东与张澜
- 306 / 交流思想,沟通感情  
——毛泽东与黄炎培

- 316 / 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毛泽东与马叙伦
- 320 / 相知在危难 携手日同行  
——毛泽东与冯玉祥
- 324 / 难得是诤友  
——毛泽东与李鼎铭
- 329 / 同坐在一条木板上  
——毛泽东与陈嘉庚
- 334 / “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与李宗仁
- 340 / 相遇贵相知  
——毛泽东与张治中
- 349 / “我们能谈得来,能合作共事”  
——毛泽东与傅作义
- 355 / “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  
——毛泽东与程潜
- 360 / 敦促起义 造福桑梓  
——毛泽东与陈明仁
- 366 / 同窗好友,情深义重  
——毛泽东与周世钊
- 373 / 肝胆相照,赤诚相助  
——毛泽东与章士钊
- 381 / 是非评说留后人  
——毛泽东与梁漱溟
- 392 /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毛泽东与张干

## 401 / 情感历程·毛泽东与家庭亲属

- 403 / “活我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毛泽东与毛顺生
- 410 / “吾母高风 首推博爱”  
——毛泽东与文七妹
- 414 / 师承先生思想之精华  
——毛泽东与杨昌济

418 / “我们两家同是一家”

——毛泽东与向振熙

421 /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与杨开慧

428 / “钢铁相撞，响个叮咛”

——毛泽东与贺子珍

439 /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毛泽东与江青

447 / “舍小家为大家”

——毛泽东与毛泽民

451 / 同根手足情

——毛泽东与毛泽覃

455 / 引导苦妹子走上革命路

——毛泽东与毛泽建

458 / 诗书家谊长

——毛泽东与毛宇居

464 / 念情而不徇情

——毛泽东与杨开智

467 / 一次解难，永世不忘

——毛泽东与王季范

470 / 念亲而不私亲

——毛泽东与文家表兄

475 / 骂娘也可以，讲给我听

——毛泽东与贺凤生

482 / 谆谆教诲 殷切期望

——毛泽东与毛岸英

## 491 / 睿眼向洋·毛泽东与外国政要

493 / 敞开红色中国的大门

——毛泽东与斯诺

503 / 枣园笑谈“纸老虎”

——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509 / 拉开中美关系新的一幕

——毛泽东与尼克松

- 516 / 以哲学思维纵论世界风云  
——毛泽东与基辛格
- 521 / 建立互相尊重的友谊  
——毛泽东与斯大林
- 527 / 从貌合神离到公开破裂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 544 / 希望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毛泽东与浅沼稻次郎
- 549 / 共谱中日友好新篇章  
——毛泽东与田中角荣
- 555 / 唇齿相依见真情  
——毛泽东与金日成
- 562 / 山高水长 情义永存  
——毛泽东与胡志明
- 569 / 共建友谊桥梁  
——毛泽东与苏加诺
- 572 / “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与吴努
- 576 / “乐莫乐兮，新相知”  
——毛泽东与尼赫鲁
- 580 / 戏言何时见“上帝”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
- 587 / “我是投你的票的”  
——毛泽东与希思
- 591 / “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毛泽东与陶里亚蒂
- 593 / 会见最后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  
——毛泽东与施密特

## 597 / 主要参考书目

## 599 / 后记

# 毛泽东与同事战友

■ 经天纬地





# 堪称史诗般的神圣合作

——毛泽东与周恩来

从1926年在广州商议开展革命斗争，到1976年同一年在北京逝世，两位世纪伟人合作共事50年。

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繁荣和强盛，为了全人类的美好理想，他们携手并肩，风雨无阻，矢志不移。

两位举世公认的天才，同为超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以不同的思维风格、处事方式，干着经天纬地之业，像珠联璧合，中轴齿轮，引动一个时代的潮流，创造出无数奇迹。

他们的组合，是社会和时代的选择，得到亿万人民的认同。撼山易，撼“毛周体制”难！

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超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时间，实为历史罕见！

## 共同主张回击蒋介石

1926年初，两位中共领导人、青年革命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广州。时值国民革命蓬勃发展，日益高涨。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忙于国民革命的政治宣传和农运工作。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等，主要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离开广东。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禁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便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赶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被蒋软禁一天。放出后，他立即到中共广东区委，与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商议，采取应变措施。大家一致认为，要回击蒋介石。周恩来说：蒋介石2月份驱逐一名左派师长（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之事，就有反共苗头。我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我们占了7个；营以下各级军官中不少是共产党人。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在思考进攻对策。他到李富春住处商议，正巧周恩来稍后也来到这里。几人共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很大，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

然而，这时全党还处在一个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对这个突然事变，毫无精神准备，也缺乏应付的经验。毛泽东、周恩来等商量出一致意见后，周恩来立即找苏联顾问研究，顾问季山嘉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当时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鲁诺夫害怕反击会影响中苏关系，并认为顾问团自身的工作有严重缺点，也主张对蒋介石让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则认为，事变同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因此，都没有采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确主张。

在激烈紧张的政治斗争中，把握时机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同共产党分裂，挑起事变是带有某种试探性质的。事发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缓和紧张局势，很快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还假惺惺地向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一面威胁、拉拢其他各军首领，使其由中立观望转到支持他。如果这时中央采纳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进行坚决回击，起码能够抑制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也很可能把蒋介石打下去，除去国共统一战线中的一大隐患。遗憾的是，这一时机被党内妥协退让的方针所丧失。仅仅过了两天，形势急剧恶化。在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的提案。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此继续退让，3月29日中央发出赘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津单地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

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我们现在应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这个指令极其幼稚，令人哭笑不得。中央还派张国焘到广州监督执行，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此后，已暴露身份的 250 多名共产党员相继撤出，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事过十几年后，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总结了这一历史教训。1943 年 11 月 17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说到：“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泽东此时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周恩来接着说：“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 500 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这里，周恩来的发言和毛泽东的插话，都充分肯定了当年他们共同提出的反蒋主张，同时对这段历史流露出一种沉重的遗憾。

党的决策者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一次重大失误，这在历史上已有定论。但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当年表现出来的独到见解和超人胆略，实为革命大潮中的凤毛麟角。他们初次共同谋事，就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一种主动配合、互相吸引的和谐。这无疑是他们今后得以长期合作、保持风雨不变的革命友谊的一个重要原因。

## 周为上级，毛为下级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1923 年在中共三大时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到 1927 年中共五大时，仅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到 1928 年中共六大时只选为中央委员。1930 年 9 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 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相当于 11 年前的职务，但还没有进入中央常委。值得幸庆的是，这期间，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则比较早地进入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周恩来 1924 年秋由法国回到中国，到 1927 年中共五届一中全会即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 7 月担任临时中央常委，11 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 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 年 1 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同年 12 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历史是这样安排的：从大革命失败前夕到 1931 年底，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领导；从进入中央苏区直至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又是毛

泽东的直接领导。在这7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两人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合作共事非常密切。周恩来作为上级领导，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尽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在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维护和保护毛泽东，体现了非常难能可贵的同志、战友情。

1928年4月底，周恩来赴苏联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共六大，11月上旬回到上海。因当时强调工人成分而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后，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作为主要仲裁人，他采取了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红四军是毛泽东亲自组建和领导的，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一支工农革命军，曾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由于当时军队成员的主体来自农民，再加上常年游击战争环境的影响，部队内逐渐暴露出单纯的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已经开始妨碍党内正确决策的贯彻执行。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曾作过批评和纠正，但因战事频繁，无法从容解决。

从1929年5月底开始，红四军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表面化了。在福建永定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前委成员就前委和军委的职权、军队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发生争执，意见未能统一，导致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执行，书记难以工作。6月8日，在上杭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书面意见，言辞激烈，表示“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客观地说，毛泽东的书面意见带有一定的情绪。会议没有就此表态，而是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毛泽东原打算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一些思想原则问题。不料，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当时称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并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于是，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

周恩来得知情况报告后，采取分清是非、坚持原则、维护团结的态度，于8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七大一些不恰当的做法提出批评，同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回答了红四军前委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信中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

命”；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指出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趋于党的一致”。信的最后，要求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应“一致地努力工作”。8月29日，周恩来等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从福建来上海的红四军代表陈毅汇报。之后，周恩来、李立三多次与陈毅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团结，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该信分析了军阀混战的形势，对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及各项工作均作了指示。信中还指出了前委存在的问题，批评了朱、毛各自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及前委注意纠正。并要前委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派专人将信送给毛泽东。对中央的处理意见，毛泽东是满意的。11月28日，他致信中央，报告他已“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成为军队建设、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从红四军内部争执不下演变到古田会议召开成功，历史就这样在曲折中走向辉煌。出现这一结果，毛泽东的作用固然是主要的，但也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处事得当分不开的。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开始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这条错误路线贯彻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和正确主张不断受到批评。同年11月初，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的名义，随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被选为中革军委委员，实际上排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领导地位。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实际工作中切身体会到“左”的错误给红军造成的损失，便有所抵制，采纳了不少毛泽东的意见，也受到临时中央的批评，说苏区中央局不认识采取进攻策略的重要，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指责他在苏区工作“不得力”。1932年7月，周恩来到前线主持战事，这是他第一次与毛泽东共同在前线指挥作战。他认为，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